

## 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在第一战区的统战工作：

### 实践路径与历史效能

胡嘉晨 姚敏

(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设立了“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简称“洛八办”）。作为中共在河南开展统战工作的核心枢纽，该机构对第一战区军政人员的统战活动，堪称国共合作时期地方统战实践的典范样本。“洛八办”的统战渠道呈现双重特征：一方面依托公文函电、正式磋商等制度化途径开展工作；另一方面借助私人交往、舆论引导等非正式方式进行联络。然而，这一统战进程并非一帆风顺，“洛八办”的工作也经历了多次起伏与调整。尽管如此，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实践探索，仍为中共地方统战工作积累了弥足珍贵的经验，也为理解战时统战策略的在地化调适提供了重要的区域研究视角。

**关键词：**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洛八办；统战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之一。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与国民党及社会各界共同抵御日本侵略者。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sup>①</sup>作为中共在国民党第一战区的重要机构，其在洛阳及豫西地区对军政群体的统战实践，是国共合作背景下地方统战工作的生动缩影，对于理解中共统战策略的落地与调适具有重要价值。学界对洛八办的研究已有一定积累，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机构史与基本史实梳理。研究者多依据档案文献，考证洛八办的成立背景、发展历程、机构设置及主要职能，如详细还原其从“通讯处”到“办事处”的演变过程，厘清刘向三等历任负责人的任职时间与工作内容。二，统战工作的宏观概述。现有成果普遍肯定洛八办在联络国民党军政人员、推动抗日合作中的作用，提及与卫立煌等主战派的互动、物资转运、人员掩护等具体事务，并强调其与国共关系演变的相互影响。

然而，相关研究仍存在有待深化的空间。现有研究已梳理了洛八办的基本历史脉络与主要职能，也初步涉及了其于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的统战往来，但对统战对象与运作机制的精细化研究仍显不足，总体来说是对洛八办针对国民党第一战区军政群体的统战实践路径的系统性探讨欠缺。现有成果多笼统提及“国民党军政群体”，未深入区分主战派（如卫立煌）、保守派及各基层军官的差异，对洛八办针对不同群体的策略分化缺乏细致分析；虽有研究提及公文往来、高层互访等方式，但对官方与非官方路径的协同机制、适用场景及成效对比关注较少。基于此，本文以洛八办对第一战区军政群体的统战工作为研究对象，力图实现视角创新。聚焦“军政群体”这一特定对象，通过区分不同层级与政治倾向，系统分析洛八办统战策略的针对性与差异性。将官方路径与非官方路径作为核心分析框架，揭示两种路径的互补机制及实践逻辑。结合洛八办档案、当事人回忆录、第一战区相关文献及《新华日报》等报刊资料，还原统战工作的具体细节与历史语境，旨在厘清洛八办统战工作的实践路径与历

<sup>①</sup> 其正式全称应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洛阳办事处”，但由于“八路军”的称呼已成为习惯，所以非正式场合多称其为“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

史经验，为理解中共地方统战策略的灵活性与原则性、丰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研究维度提供新的视角。

### 一、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的成立

中国共产党在洛阳设置八路军办事处，是基于抗战战略布局的需要。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在东北率先举起抗日的旗帜，并多次发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声明。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前，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抵抗日本侵略，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国共合作抗日局面初步形成。1938年5月，徐州失守，6月武汉会战爆发后，中共中央认真分析了当时形势，认为豫西地区极有可能被占领山西的日军从济源附近渡过黄河从而侵占，洛阳毫无疑问便是其重点进攻地区。如果日军占领洛阳，便掌握了极大便利，东可控制平汉铁路，西可直逼西安方向，进而危及整个西北。此时，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已经因抗战局势迁到洛阳，洛阳山地众多，交通便利，成为中原的抗战指挥中心。于是，中共中央决定在洛阳设立八路军办事处，一旦洛阳及豫西沦陷，便以此办事处为基础，联络当地地方武装，发动广大群众在伏牛山区和桐柏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毛泽东亲自同负责筹建洛八办的军委统战部负责人刘向三谈话并布置了具体任务。他指出，办事处的主要任务有三项：“一是宣传党的政策、抗战的主张，要在国民党上层人士中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二是日军一旦过河，在豫西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那里客观条件是好的；三是办事处是我军在那里的合法机关，地方党组织工作如有困难，应尽可能提供方便。”

1938年9月，朱德、彭德怀以第十八集团军正副司令的身份签署了相关文件。同年10月，刘向三带领五十余名工作人员，携通讯电台、军用地图等相关物资自延安奔赴洛阳，与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展开多轮交涉，商议办事处落地事宜，却遭到对方的多次回绝。为了消解程潜的顾虑，刘向三深思熟虑后主动作出让步，提出八路军可撤走绝大多数人员，仅保留少量工作人员与通讯电台设立通讯处，这一方案最终得到程潜的勉强认可。随后，刘向三完成登记备案流程，该机构正式获得合法身份。机构全称为“第十八集团军驻豫通讯处”，办公地点设于洛阳南关贴廓巷56号。该机构虽以通讯处为名对外公示，但日常公务中的印章、行文与官方关防，均采用办事处的名义。1939年1月，卫立煌调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早在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任上，卫立煌便已同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主要领导人有过数次商洽联络。此外，中共秘密党员赵荣声受组织派遣，前往国民党第一战区总部做统战工作，此时担任卫立煌的秘书。刘向三向卫立煌详述了洛阳当地的军政局势后，正式向其提交将洛阳通讯处升格为办事处的申请，很快便得到卫立煌的首肯。至此，原来的通讯处正式更名为“第十八集团军驻洛阳办事处”。1941年12月，蒋介石以“中条山战役失利”为由，撤去了卫立煌的第一、二战区的一切职务。1942年1月，一贯奉行顽固反共立场的蒋鼎文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他上任后，常常派遣特务对洛八办工作进行监视跟踪，并以强硬态度勒令撤销洛八办。1月31日，洛八办人员被迫宣布撤退计划，次日凌晨展开撤退。袁晓轩在长官部办理撤退手续时，被蒋鼎文强行扣留。在威逼利诱下，袁晓轩叛变投敌，供出回总部人员的时间和路线。

办事处正式建立后，进行了一系列机构建设与人员任免，办事处设置处长一人统管全处事务，同时设立总务科、秘书科、交通科、发行科等业务科室，配套设立警卫排、电台室与招待所，内部建有党支部。办事处最多时有130余名工作人员，分别担任战士、秘书、文化教员、译电员、卫生员、炊事员、饲养员等不同职务。处长先后由刘向三（1938年10月—1939年4月）、刘子久（1939年5月—1939年10月）、袁晓轩（1940年5月—1942年1月）担任。秘书主任先后由刘泽如（1938年10月—1939年4月）、王吉仁（1939年4月—1940年5月）、徐立行（1940年5月—1941年10月）担任。作为联结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与国民党第一战区的核心枢纽，洛八办在抗战时期的国共合作进程中承担了关键的统一战线职能。

## 二、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统战工作的实践路径

开展统战工作是洛八办设立的一个重要目的。洛八办建立后，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的各项指示，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就统战对象来看，洛八办主要面对的是第一战区的军政群体，具体包括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等国民党上层人士，以及其下辖部队。受国民党反共政策变化、第一战区内部派系矛盾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洛八办对主战派、保守派等不同群体实施了官方实践路径和非官方实践路径等具有差异性的统战策略，其统战工作呈现出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统一。洛八办谨遵中共中央的指示，不负众望，建立了包括卫立煌在内的一大批统战关系，积极向统战对象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功绩，取得了良好的统战工作成绩，成为了中共中央在第一战区的窗口。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

### （一）官方实践路径

洛八办对第一战区军政群体的官方统战实践路径，是依托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合法框架，以中共高层与战区司令长官的互访、双方机构的公文函电往来、专题军事会议协商为核心形式的制度化沟通渠道。它是争取战区最高层主战派支持、解决防区划分、物资转运、人员释放等全局性重大问题的核心抓手，其中对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的统战则是官方路径的重中之重。1939年初至1941年末卫立煌执掌第一战区期间，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多持认可态度，也基本上秉持着国共合作抗日的总体立场，双方在抗战事务中整体往来关系较为融洽。刘少奇、朱德、彭德怀等中共领导人都曾亲赴洛阳，与卫立煌当面会商抗战事宜。卫立煌也注重维系与中共的友好往来，时常在长官部招待到访洛阳的八路军与新四军各级将领。刘少奇曾谈到：“我们要交卫立煌这样的朋友。八路军要建立根据地，不少地方是蒋介石划给卫立煌的防区；八路军要组织游击队，建立地方政权，不少地方是在国民党让他管辖的范围之内。”1941年，中共中央书记处与中央军委在致彭德怀等前方将领的指示电中着重申明：“我们须极力同他拉好，予以种种援助，万万不可把关系弄坏。”可见，争取卫立煌的支持意义重大。

中央多次电示洛八办重点做好与卫立煌的统战工作，洛八办积极落实指示。刘少奇曾三度前往洛八办开展工作，尽管每次在洛停留时长有限，却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落地执行、以及豫西地区党组织的发展与巩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39年初，刘少奇化名“胡服”第一次抵达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面向办事处全体人员宣讲六届六中全会的会议精神，解读毛泽东在此次会议上作的《论新阶段》报告。在洛阳停留时，刘少奇也数次与卫立煌会面，共同磋商抗日合作相关事宜。1939年1月和12月，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两次来到洛八办，对洛八办工作进行指导，并作了形势报告。阎锡山制造山西十二月事变后，彭德怀到洛阳与卫立煌商谈此事并观其态度，并在洛阳举行中外记者会，揭露国民党制造摩擦、迫害山西新军的事实。1940年5月，朱德赴洛阳会晤卫立煌，就八路军在中条山的补给运输通道事宜，以及我方被扣押人员的释放问题展开协商。

除高层正式互访外，常态化的公文函电往来是洛八办官方统战路径的日常重要载体。作为当时八路军在第一战区的唯一公开合法联络机构，洛八办承担着延安、八路军总部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之间的信息中转与事务对接职能。“卫从其长官部电台发出的电报，其内容总会被军统特务查悉；卫就改变办法，当他向延安或八路军总司令部发电报时，他就把自己的电报交给联络参谋，由洛阳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电台用八路军的密码代为拍发。”现存洛八办电报档案显示，1939年1月至1941年12月卫立煌任职期间，双方互通的正式函电达百余封，内容覆盖多个领域，形成了一套稳定的官方沟通机制。其中军事协同类电报是战时沟通最频繁的内容，尤其集中在1941年中条山战役前后，5月10日，毛泽东、朱德通过电报转告卫立煌，“八路军自当与中央军配合作战”。洛八办主动向卫立煌部通报八路军在晋南、豫北的游击部署，卫立煌也通过电报向八路军总部希望八路军能配合正面战场牵制日军侧翼，提出切断日军后方补给线的协同作战方案。5月12日，卫立煌通过洛八办向八路军

总部提出“最近开展正太、同蒲交通战于敌运输”的请求与“准备反攻”的信息。5月29日袁晓轩向中央的汇报电报显示，卫立煌对八路军的主动配合作战比较满意。战役结束后双方还就中条山残余部队收编、敌后根据地建设等问题持续沟通。后勤补给类电报则是解决八路军实际作战困难的重要渠道，洛八办多次通过正式公文向卫立煌部申请战区物资运输通行证、交涉被封锁的交通线，卫立煌对多数请求予以了批准，允许八路军在洛阳设立公开的物资采购站。人员交涉类电报主要解决被俘人员释放、中共党员掩护、部队编制认定等问题。每当国内政局出现波动，洛八办都会第一时间向卫立煌部发出正式函电阐明中共的抗日立场和政策主张，卫立煌也会反馈第一战区的军政动态和他对时局的看法，1941年“皖南事变”后，为得到卫立煌不参与反共内战的明确回应，洛八办积极传递电报，有效遏制了摩擦向中原地区的蔓延。这些制度化的函电往来，将高层互访达成的共识转化为具体行动落地，使卫立煌在武器弹药调拨、军事情报共享、过往人员通行等方面持续给予八路军支持，成为统战工作官方实践路径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 （二）非官方实践路径

除正式的会见与公文往来外，洛八办也注意通过人际联络建立信任关系，开展统战工作。洛八办借助中共秘密党员赵荣声担任卫立煌秘书的便利条件，深入开展统战工作。赵荣声常到洛八办汇报从司令长官部获取的消息，实时了解第一战区军政群体的思想动态。洛八办工作人员与第一战区各部队中的中共地下党员密切配合，他们在各自所在部队的上层开展统战工作，通过私下交流、传递信息等方式，促使部分国民党军队成员与八路军友好相处、携手抗日。当时第一战区各部队与相关机构大多在洛阳设有各自的办事处或通讯处，这类驻洛机构之间逐步形成了每月举办一至数次聚餐会的惯例，由各办事处轮流做东。聚餐会的主要功能是增进联系、互通情报、探讨时事。洛八办充分利用这一机会，不仅平时积极参与，有时甚至主动组织，广泛结交各部队驻洛代表，大力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增进国民党军队对中共的了解与信任，通过这些交往去争取和影响各个部队。这些部队在多方支持洛八办，并协助八路军、新四军抗日。例如，1940年8月八路军在华北发起百团大战后，第38军随即出动兵力，在同蒲铁路南段等地区连续发起数十次出击，有力配合与策应了八路军的作战部署。此外，第9军第47师还邀请洛八办委派干部担任其军法处长，协助其开展部队的政治建设工作等。

洛八办也通过赠送散发延安出版的书籍、刊物，进行舆论宣传，凝聚抗战共识，这是非官方统战路径的重要延伸，与人际联络形成互补。如向卫立煌及其幕僚等有统战关系的国民党军队上层人士赠送《新华日报》（华北版）、延安出版的《解放》和新四军创办的《拂晓报》等，介绍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抗战的情况和业绩，使其及时了解中共的政策。卫立煌对这些书报并不反对，反而流露出不少兴趣，他曾告诉过赵荣声：“八路的书报我们关着门研究”。同时，向第一战区部队赠送《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书籍，宣传中共的抗战主张和各项方针政策。此外，洛八办还创办刊物《前线日刊》每日印发。百团大战期间，洛八办专门加印战报特刊，集中散发至第一战区各部队，直观展现八路军敌后作战的成果，传递战况，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对中共“游而不击”的污蔑。“皖南事变”爆发后，为了让更多人了解真相，洛八办印制大批宣传品，披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径，并向第一战区各军驻洛办事处及学校、机关散发。卫立煌出于抗战大局考虑，并未下令查禁这些宣传品，这一举措使更多军政人员得以了解事变真相，争取到部分国民党官兵对中共的理解与同情，有效遏制了反共舆论在中原地区的蔓延。

## 三、对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统战实践路径的剖析

洛八办依托官方与非官方两条实践路径，在第一战区军政群体中持续开展统战工作，形成了一套贴合实际、兼顾原则与灵活的实践模式。深入剖析这些实践路径，既能清晰还原当年统战工作的运作逻辑，也能从中提炼出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

### （一）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统战实践路径的意义

洛八办作为抗战时期的重要战略枢纽,其统战工作具有多个方面的重要意义,具体如下:一是,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既是洛八办统战工作的意义之一,也是其开展统战工作的主要目的。洛八办通过对第一战区军政群体的统战工作,有效争取了卫立煌等国民党主战派的理解与支持,推动国共两党在军事协作、区域划分等问题上达成共识。在中条山战役期间,双方协调配合作战,八路军主动出击牵制日军,为正面战场减轻压力,体现了统战工作对凝聚抗战合力的实际作用。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河南地区的影响力,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存续提供了地方实践上的支撑。

二是,扩大了中共政治影响力。通过赠送《论持久战》等著作、散发八路军战报、传递中共抗战主张等方式,洛八办的统战工作使第一战区军政人员更直观地接触到中共的抗日政策、了解到中共的抗日决心。卫立煌等第一战区将领对中共政策的认同,以及第一战区部分国民党部队与八路军的协同作战,不仅提升了中共在国统区的政治声望,也为后续根据地建设争取了更有利的外部环境。

三是,保障了中共地方工作开展。洛八办以公开机构身份为河南地下党组织提供掩护,帮助地方党员转移、输送干部,并通过统战关系为根据地采购物资、办理通行手续。经过长期统战工作,卫立煌等第一战区军政群体多次为其提供保护和便利。由于与卫立煌建立了良好的统战关系,华北根据地得以快速发展,也为新四军彭雪枫部改善了处境。

四是,提供了统战工作实践路径的参考。洛八办存在的三年多时光虽然短暂,其在统战领域的持续探索与实践,既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沉淀了扎实的实践经验,也为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构建与完善留下了极具参考价值的现实范本,具有深远影响。

## (二) 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统战实践路径的经验

统战工作的开展是洛八办建立的重要作用。深入分析和总结这一历史时期统战工作实践路径的经验具有如下重要意义:

一是,统战工作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必须掌握规律、坚持原则、讲究方法,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是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党中央对洛八办的工作高度重视,毛泽东多次就相关工作作出指示,刘少奇、彭德怀、朱德等同志也多次亲临办事处,指导并部署各项工作。洛八办的统战工作始终是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进行的。

二是,统战工作要重视科学理论指导。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所践行的统一战线方针,“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大成果。”洛八办的统战工作始终以中共的科学理论为指引,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与抗战时期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著作不仅是指导全国抗战的战略纲领,也为洛八办开展统战工作提供了思想武器。同时,洛八办严格遵循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在维护国共合作大局的同时,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径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既坚守了原则底线,又争取了多数力量的理解与支持。科学理论的指导使洛八办的统战工作避免了盲目性,确保了在复杂局势中始终保持正确方向,为有效团结第一战区军政群体、凝聚抗战合力提供了坚实的思想保障。

三是,统战工作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网络。洛八办不仅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等上层军政机构建立联系,还通过掩护地方党组织、联络地方武装等方式,建立起了广泛的统一战线网络。洛八办深入第一战区军政群体和当地各界群众,积极争取同情和支持,同时注重与不同身份的先进分子联合,形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联盟,凝聚了各方抗日力量,扩大了统战工作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四是,统战工作要灵活运用多种统战策略。洛八办针对不同的统战对象,采用不同的统战策略。如对主战派的卫立煌等,采取积极争取、加强合作的策略,而对保守派等则采取灵活应对、分化瓦解的方式。同时,综合运用官方和非官方的实践路径,既有公文往来、会议协商等官方实践路径,又有人际联络、舆论宣传等非官方实践路径,使统战工作更具针对性

和实效性。

####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是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必须长期坚持”。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把统一战线摆在重要位置，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的统战实践，正是这一统战工作在抗日战争时期地方场景中的生动演绎，其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为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提供了深刻的镜鉴。从历史纵深来看，洛八办的三年多历程，虽处于国民党反共政策反复、第一战区派系斗争复杂的夹缝中，但是却始终坚持团结抗日，走出了一条官方实践与非官方实践并重、坚守原则与灵活策略兼顾的统战路径。这种实践不仅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原地区的根基，更让“全面抗战”“持久抗战”的理念深入第一战区军政群体，为中共在国统区赢得了广泛的政治认同。

历史川流不息，统战精神代代相传。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的故事虽已定格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但它所彰显的团结智慧，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攻坚克难的重要密码。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变的是历史语境与具体任务，不变的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战略思维。唯有传承好这一宝贵遗产，在实践中不断创新统战方法、拓展统战领域，才能凝聚起磅礴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筑牢最坚实的团结基石。

#### 参考文献

- [1] 刘向三.往事的回忆[M].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 2001.
- [2] 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确山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刘少奇主持中原局[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3.
- [3]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第3册[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01.
- [4] 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 [5] 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3.
- [6] 胡传章.简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八路军办事处[J].江苏社会科学,1995,(6):100-105.
- [7] 牛建立.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述论[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8(01):77-83.
- [8] 王鑫宏.抗战相持阶段的国共关系——以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为中心的考察[J].党的文献, 2018, (04):82-90.
- [9] 杨晓芬.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及其历史意义[J].党史文苑,2024,(10):49-51.
- [10] 王丹,赵光付.八路军驻洛办事处的历史作用及其时代价值探析[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21,40(10):1-4.
- [11] 王子君,杜武.洛八办:抗战统战工作的最前沿[N].洛阳日报, 2011-05-24(009).
- [12] 申利超,李三旺,栗少鹏.“洛八办”:抗战烽火中的坚强枢纽[N].洛阳日报, 2025-08-04(004).

## United Front Work of the Eighth Route Army Office in Luoyang in the First War Zone: Practical Approaches and Historical Effectiveness

Hu Jiachen, Yao Min

(School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China, 150080)

**Abstract:** Following the full-scale outbreak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stablished the Eighth Route Army Office in Luoyang (commonly abbreviated as "Luo Ba Ban," a liaison office) at the station of the Kuomintang's First War Zone Command, with the aim of consolidating and expanding the Chines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As the core hub for the CPC to conduct united front work in Henan, its united front engagement with military and political personnel in the First War Zone stands as a paradigmatic example of local united front practice during the period of KMT-CPC cooperation. The united front channels of the Luo Ba Ban feature dual attributes: on the one hand, it operated through institutionalized approaches such as official documents, correspondences and formal consultations; on the other hand, it maintained liaison via informal means including private interactions and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Nonetheless, this united front endeavor was by no means plain sailing, and the work of the Luo Ba Ban went through multiple rounds of fluctuations and adjustments. Even so, its practical exploration under specific historical conditions has accumulated invaluable experience for the CPC's local united front work, and provides a vital regional research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localized adaptation of wartime united front strategies.

**Keyword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ighth Route Army Office in Luoyang; Luo Ba Ban; united front

**作者简介 (可选):** 胡嘉晨 (2005-), 男, 汉族, 河南洛阳人, 黑龙江大学历史系学生, 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姚敏 (1987-), 女, 汉族, 河南商丘人, 黑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